



|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 |

理论周刊精选集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8月间，北京市委成立《北京日报》总编辑部和《北京日报》筹备处，开始《北京日报》的筹备工作。

9月27日至29日，《新民报》连续3天发表了《北京日报》创刊启事，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正式创刊。北京市副市长、副市长兼市长都到兼任社长，副社长周勃任总编辑。

《北京日报》的创刊，结束了自《北平解放报》停刊后，市委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公开报纸的状况。

京
系
报
书

北京日报
1952-2012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

理论周刊精选集

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日报创刊 60 周年纪念文集·理论周刊精选集/北京日报创刊
60 周年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477 - 0722 - 7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2504 号

理论周刊精选集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 - 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1756 - 8018

总编室: (010) 65252135 - 8043

网 址: www.bjd.com.cn/txcbs/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北京日报创刊 60 周年 纪念文集编委会

主 任 梅宁华

副主任 赵靖云

编 委 陈 星 任欢迎 张雅宾 孟春明
刘爱勤 郑京湘 邵镇军 初小玲
张明非 伍义林 郭 坦 李 乔
陈 先 梁凤鸣 温子健 李培禹
丁亚韬 付 堃 耿瑞林 毛晓刚
陈美秋

总序

北京日报社社长 梅宁华

从1952年创刊至今，北京日报已度过60载春秋。我到北京日报任社长也已六载有余。总想对北京日报的历史地位做一些评价，思量再三很难成文。用笔墨来记述北京日报的风雨历程和历史作用，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胜任的。但这又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感慨之余，挥笔拟文。

立场鲜明、政治坚定是北京日报一以贯之的风格和特征。北京日报作为北京市委机关报，地位特殊、影响力强、责任重大。60年间时代演进，风云激荡，北京日报作为党的喉舌，秉持为国家为民族进步鼓与呼的宗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抒写北京发展的壮美画卷，记述人民建设和生活的真实场景，构建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以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为己任，以宣传党的主张为使命，形成了鲜明的首都党报特色，经受了历史风雨的洗礼，确立了坚实的主流媒体地位。

求真求是、勇于承担是北京日报始终坚持的办报信念。从繁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求本质，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把握规律，在思想的碰撞中探求真理，是北京日报60年办报实践的写照，是北京日报几代报人的新闻追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北京日报保持活力的源泉。无论舆论环境发生何种变化，传媒方式出现何种形态，坚信用真实的思想，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才能发挥引领舆论的作用。这是一种坚持，在舆论多元的条件下更需要这种坚持；这是党报的责任，在媒体多样的形势下更应负起责任。

与时俱进、敢于创新是北京日报长盛不衰的动力之源。坚持解放

思想，宣传改革开放，开展舆论监督，批评假恶现象，在发挥党报功能方面不断探索，勇于实践，使北京日报更加充满活力。打造精品栏目，推出精品制作，调整版面结构，扩大版面容量，使北京日报不断适应社会要求，推陈出新，保持强大的生命力。60年间，北京日报从四版内容发展到大型综合报刊，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和付出。不仅如此，今天的北京日报已发展成为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管理科学，经营多元的大型现代化报业集团，在传媒市场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北京日报坚持深化改革，加强科学管理的成果，也为北京日报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一篇短文难以言尽，但我坚信，历史已经对北京日报的60年的历程作出了客观评价，时空推移，历史还将作出更准确的评价。

2012年9月8日

目 录

启动管理新思维	成思危 / 1
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戴 逸 / 4
“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	冷 溶 / 10
我们仍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我党历史看党的思想路线	邢贵思 / 14
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	季美林 / 17
雇 8 个工人是划分剥削的界限吗 ——澄清对马克思一个论述的误解	卫兴华 / 25
我为什么主张“文化自觉”	费孝通 / 29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	任继愈 / 33
论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	王梦奎 / 36
苏联解体的另一条深刻原因	陈先达 / 39
重新审视社会公平问题	刘国光 / 41
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	李君如 / 4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	龚育之 / 52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冷 溶 / 56
中国不会出现“奥运后的滑坡”	厉以宁 / 61
近现代史研究应为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公民服务	张海鹏 / 65
以党的先进性建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郑科扬 / 68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邢贵思 / 74
儒学与当今全球性三大难题	汤一介 / 77
多党制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房 宁 / 81
正确评价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	章开沅 / 84

改革开放与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判断	吴建民 / 87
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	甄 言 / 93
毛泽东认识美国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轨迹	宋贵伦 / 99
从“以民为镜”到“以人为本”	张岂之 / 104
关于“共有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	李德顺 / 107
实事求是纵横谈	梁 衡 / 111
和谐权也是基本人权	徐显明 / 121
对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进程的思考 ——兼论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梅宁华 / 125
李大钊为何没有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	侯且岸 / 137
中国文化：“走出去”！	叶小文 / 140
再谈“中国特色”	沈宝祥 / 147
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再检视	陆学艺 / 151
我国监督机制的重点应放在哪里	许崇德 / 155
漫谈“文化强国”战略	许嘉璐 / 157
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建设四题	陈 晋 / 165
误判国情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马龙闪 / 171
回顾与思考：“西化”与“中化”的百年论争	俞可平 / 175
让“包容”成为国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邓伟志 / 184
重温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石仲泉 / 186
如何破解文化发展繁荣这个大课题	朱铁志 / 194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把握三重逻辑	衣俊卿 / 196
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	李忠杰 / 199
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仍有待深入	刘世锦 / 206
科学发展日益成为全球核心问题	庞元正 / 209
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	辛 鸣 / 214
生态文明：从文明的高度实施可持续发展	徐崇温 / 219
后 记	221

启动管理新思维

成思危

管理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一直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为了适应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形势，管理科学家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管理的革命：

管理的战略目标，特别强调 从环境的变化中寻找机会并避免威胁

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形势下，企业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不仅要注意短期的利润，更要注意所有者权益的长期增值，还要兼顾企业利益（例如增长速度、利润、劳动生产率等）、客户利益（例如价格、质量、交货期、售后服务等）和社会利益（例如保护环境、社会服务等）。事实表明，有的小企业由于尽量为客户着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尽管一时处于亏损状态，其股票仍一再攀升，前途无量；而有的大企业虽然赢利丰厚，但公众形象不好，将来就有可能被淘汰。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不仅要在国内竞争，而且要到国际上去竞争，故应特别强调从环境的变化中寻找机会并避免威胁。再加上顾客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多数传统产品供过于求等原因，企业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其首要的战略目标也由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向提高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领导一定要全面考虑上述各种竞争力的因素，明确自己的强处及弱点，从而确定本企业的竞争定位。更重要的是要识别、培养和发挥本企业的核心能力，树立“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目标，力争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中有立足之地。

要把“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放在首位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因此，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许多管理科学家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包括人员的招募、选拔、培养、考核、使用和维系等方面。许多企业都加强了人员的培养，并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提供购买公司股票的期权）来留住人才。对人才的评价也趋向于从智商（IQ）转向情商（EQ）。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时期特别盛行定量的分析方法，使得管理科学几乎成了运筹学的同义语。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解决管理问题不能单靠定量分析方法，还必须与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因此，管理科学必须与信息技术和行为科学相结合。例如，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路径选择问题，从传统管理科学家的观点看来，只要用运筹学求出最短路径就可以了。但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这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可能会在最短路径上因堵车而增加油耗且浪费时间，如能给某一司机提供信息，使其了解路况，那么该司机可能会选择另一条更好的道路。但即使所有的司机都能通过无线电台而获得路况的完全信息（信息完全对称），行为科学家还要考虑到司机的择路行为，有经验的司机往往会对路况的变化作出更好的判断而选择更好的路径。这就说明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的素质和主动性就更加重要。这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谋而合。

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也应当适应“以人为本”的观念，例如，在许多企业中，由于分工过细造成了手续繁杂、交接频繁、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局面，再加上产品品种增多和生产批量减少，过细的分工就更加显得不够灵活并造成人员和设备的利用率降低；单调乏味的操作也会抑制职工的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在某些情况下，减少分工甚至由一个人包办某项工作反而可以提高效率。分工过细也造成了管理上的集权，因为各部分的矛盾只能由负责全面的管理人员来协调。这样，往往会由于各部分坚持自身利益而使得协调困难，决策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减少管理层次，将协调权适当下放，以此调动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能是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

组织素质和应变能力的提高，孕育新型的组织方式

组织素质是一个组织的根本优势之所在，而组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则要靠不断的修炼，即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更要强调组织的进化性和应变能力。一个组织要想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能够从外部准确而及时地获取信息，迅速调整自己的内部结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在组织方式上提出了无固定边界的非正规组织、层次很少的扁平型组织、成员之间能有效沟通的网络状组织、有利于鼓励内部创新的半自治式组织，等等。

信息技术的发展能有力地促进组织的变革，例如由于能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及各种数据库）、规则共享（通过各种规范和规则的数据库）、方法共享（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决策支持系统）和经验共享（例如专家系统），以及操作自动化和控制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就可以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完成以前需要由许多人分工完成的复杂任

务，还可以大大减少组织层次，实现组织的扁平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可以使企业能够通过网络及时而准确地从外部获得信息，不失时机地开拓市场，并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下及时进行大胆的战略调整，把握好战略的转折点而渡过危机。

单纯的竞争战略被“竞争—合作”战略取代

由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在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占据垄断地位，压低进料价格，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有许多缺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联合与兼并之风不仅在工商企业之间加速流行，而且还扩展到金融业及其他服务业。而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还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及开拓市场，并分享其利益。

(本文发表于1999年8月4日)

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戴 逸

在20世纪这100年内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仅前半个世纪，就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期，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著述体例也有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等等。

论史学特点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鲜明地提出历史是前进的运动。梁启超以后的历史学家，无不信从近代进化史观，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

近代进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它促进了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缚。五四运动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这是伟大的进步。这种批判也以进化史观作为其思想武器之一。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是基于历史进化的思想，这样就产生了疑古辨伪思潮。

第二，唯物史观的运用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历史学仅仅具有进化史观，还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唯物史观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并超越了进化史观。它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呢？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但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经济原因。唯物史观一方面区别于唯心

史观那种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和上层建筑视为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观点。三是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做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阶级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我们既要看到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作用，又不能把社会看成仅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本世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指导作用。

第三，20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所谓理性精神，就是承认人具有正确认知客观历史的能力，用人的心智来分析、论证、解释历史，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演绎出结论，一旦离开理性，就无法正确认识问题。清代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乾嘉史学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不受权威影响，有独立的研究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在理性精神的启示下成长和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反映了这两种认知方法的不同理路：是理性分析还是直观感悟，是科学认知还是人文关怀。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胡适揭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四，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梁启超早年参加了戊戌爱国维新运动。章太炎是辛亥革命中的战士，陈垣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著《通鉴胡注表微》，表彰民族大义；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研究和歌颂祖国大好河山；郭沫若、翦伯赞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描述宋史、南明史，歌颂了屈原、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等不屈的民族英雄，鼓舞了全民族英勇抗战的精神。

第五，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成绩很大，但也存在很大缺陷：一是封闭性，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只知有中国史，不知有世界史；二是在传统的中国史中，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三是传统史书线条简单、内容狭窄，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缕述王朝之兴衰更迭，较少涉及社会多线的立体层面。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封闭、狭隘观念，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把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提上重要日程，形成世界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鼎足三分的局面，又重视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文化思想、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动，下层民众

的生活、思想、信仰、习俗以及众多少数民族的发展，使得历史学的涵盖面更加广阔，内容更加丰富全面。

第六，在20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考古发掘大规模展开，古代墓葬、器物、竹简、帛书、殉葬物、工艺品大批出土，大大促进了历史研究，改变了单靠传世文献去探知古代历史的局面。还有，流落在海外的古籍与史料传回国内，西方人士有关中国的记录、报道，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如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以及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史料的发现、运用，近代档案、文集、方志、笔记、报刊的整理和出版，给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使从前沉埋未知或争论不决的历史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本世纪历史学所以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除了历史观、方法论的原因外，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阳殷墟的发掘大大推进了殷商史的研究，使甲骨学得以诞生。大批战国、秦汉、三国竹简的出土，使简牍学得以诞生。敦煌藏经、文书、壁画的发现，推进了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使敦煌学得以诞生。故宫明清档案的公开于众，推进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使中国历史档案学得以诞生。

论历史学家

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家，处于社会剧变和转型时代。当时中国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再也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必须走新的道路，用新的观点与方法重新诠释全部的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学遂呱呱坠地。

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派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近代第一位起而呼唤新史学诞生的是梁启超。他批评了传统史学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实验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上古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对中国历史学界影响甚大。

“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主张“打倒孔家店”。李大钊、鲁迅、梁启超等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对之做猛烈的抨击，自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此后不久，清华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表现出回归传统的倾向，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学者致力于融合中西学术，继续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20世纪除了实证史学以外，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此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与《中国近代史》二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做了全面的阐明，教育了当时千百万革命者和后代的历史学家。还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重点以及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也有许多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

论史学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占领了史学阵地。历史学界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讨论了诸如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少数民族史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提高了思想认识，活跃了学术空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内，出现了一些有水平、有特色的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本，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及其他通史、断代史、专门史著作。

17年间，中国历史学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和弊端。主要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史学领域中表现为拔高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地位，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农民战争史几乎代替了整个的中国历史。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连陶渊明、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也失去了

光彩。到“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农民起义的领袖很多也被打倒。项羽出身贵族，自应在被贬之列。刘邦、朱元璋后来背离农民，蜕化为地主阶级，李密投降了唐朝，宋江受招安，李秀成成了叛徒，都受到了批判。历史人物大多被否定，中国历史上一片黑暗。“文化大革命”即是从历史学界打开缺口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当时“左”的倾向十分严重，后来影射史学流行，全民“批林批孔”，学习儒法斗争，批水浒、批宋江，历史学成为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

“十年浩劫”以后，中国历史学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累计出版的史学著作、回忆录、地方史、资料集有 2 万多种，各类史学文章不下 20 万篇，研究工作得到长足的进展。

新世纪史学展望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即将走完百年路程，跨进 21 世纪。在新世纪会有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和文化工程被提上日程，如编写大型的中国通史、大型清史、大型中华民国史、大型中共党史、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加强对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和各种专门史的研究。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更加拓宽研究的领域。当前，历史学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科学研究呈现整体结合的趋势，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方兴未艾，诸如社会史学、人口史学、生态史学、心理史学、城市史学、计量史学正在崛起。由于跨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从其他学科中借用了新概念、新模式、新方法，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真正全人类生活发展的整个过程纳入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致力于通史研究与专史研究的结合。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把 20 世纪近现代史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予以特别的关注。人们惯常要考察昨天的事件，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取教益，增长智慧。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将深入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事件、人物、思想、制度，做出公允的评价。

历史学的繁荣常常和新史料的发现、公布有关。我国历史悠久，还有许多未为人知的重要史料隐藏在各处，如深埋在地下的古代陵墓、城垣、民居、实物。随着基本建设的进展，考古发掘将会有重大的收获。即拿现存古籍来说，亦数量众多，浩如烟海，分散度藏于全国各地，至今尚无精确统计，更谈不上整理、出版和利用。下世纪内将会对存世古籍进行全面清查和大规模整理，这批丰厚的文化遗产将推动历史研究更快前进。21 世纪，将有大量史料需要挖掘、整理、刊布、利用，将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总之，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将是历史学繁荣的起点。

随着科学技术和电子信息的发展，历史研究的观念、手段、工具正在发生重大革命。这将给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利用电子计算机寻找、积累、贮存历史资料，通过对计算机整理出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用统计图表和数字公式来显示某种历史趋势，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和推广将使历史研究跨入广阔的新天地。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定能繁荣昌盛，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发表于 2000 年 4 月 17 日)